

► 重庆文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新闻

求真方法论研究

米丽娟 著

XINWEN
QIUZHEN
FANGFALUN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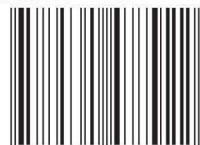
米丽娟（1970—），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和传媒文化的研究与教学。1992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随后到厦门特区工人报社工作，1994年初调入厦门电视台，从事新闻采、写、编、播、评、拍等业务以及栏目策划与广告经营。2005年考入四川大学文艺与传媒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获博士学位，成为重庆文理学院的引进人才。曾被选拔为教育部“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留学人员，到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访学。

新闻

求真方法论研究

XINWEN
QIUZHEN
FANGFALUN YANJIU

ISBN 978-7-5614-7792-2



9 787561 477922 >

定价: 28.00元

目 录

1 导论	(1)
1.1 问题的由来	(1)
1.2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29)
1.3 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意义	(39)
2 关键概念：新闻、新闻真实及新闻求真	(45)
2.1 关于新闻的定义	(45)
2.2 新闻真实的生成机制	(63)
2.3 新闻求真的社会发生学原理	(78)
2.4 新闻求真的基本特征	(90)
3 新闻求真的三重门	(105)
3.1 新闻求真的进程	(105)
3.2 三重门：符号、机制和受众	(111)
3.3 打开三重门	(117)
4 新闻求真的悖论及消解	(135)
4.1 新闻求真的伦理困境	(135)
4.2 信息论视阈中的新闻求真伦理困境	(143)
4.3 新闻求真伦理困境及信息冲突的消解	(147)
5 新闻求真的框架理论	(151)
5.1 价值框架	(151)
5.2 法律框架（在他律中求真）	(160)

5.3 叙事框架	(174)
5.4 阐释框架	(188)
6 新闻求真的平衡原理（在理性中求真）	(203)
6.1 新闻报道面临的平衡问题	(203)
6.2 新闻求真平衡原则的基本内涵	(212)
6.3 新闻求真平衡原则的把握	(220)
6.4 议程设置、新闻策划与新闻求真	(231)
7 新闻求真的伦理规范	(243)
7.1 新闻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243)
7.2 作为文本与实践的新闻求真伦理规范	(260)
7.3 当代中国特色新闻求真伦理规范的建立	(270)
7.4 人民记者应具备起码的社会良知	(278)
结语：让新闻求真在规则与自由之间游走	(287)
后 记	(292)

1 导 论

“新闻求真”是个看上去简单、说起来复杂的问题。“看上去简单”是因为它似乎是常识；还因为它已成口号，如宣传标语，不值得研究。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新闻造假才值得研究。美国传播学界总结出的“乐队花车法”“光辉幻化法”“洗牌作弊法”等八种宣传技巧实质上就是对新闻造假术钻研的结果。虚假新闻屡禁不止也是新闻造假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似乎研究“如何制假贩假，如何把假做得比真还要显得真”才具有立竿见影的现实意义，就像“厚黑学”受到追捧一样。“说起来复杂”是因为稍不注意就容易把说者说“昏”，接着把被说者说“浑”，然后把受者也搞得云里雾里，最后怕要以“说不清楚”收场。笔者作如下说，试图把它说“清”。

1.1 问题的由来

新闻求真与新闻本身如影随形。自从有了新闻，人类就面临着新闻求真问题，而新闻又与人类相依相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新闻传播现象，只不过最初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就是新闻传播，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内容就是“新闻”，后来有人称其为“信息”“消息”“传闻”“传说”“讯息”“资讯”等等。中国古代还将文字传播的新闻叫作“露布”“揭贴”。据考证，“新闻”这一称谓最早出现于《新唐书·隐逸》，唐初孙处玄曰：“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当时武周与李唐争权，孙记录为“新文”，此系中国典籍最早涉及

“新闻”一词。

生存主体间的交流表现为新闻传播现象，其实质是“意见交换”。但新闻传播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换，它是人类社会发展 to 较高阶段的产物。其前提是人们普遍具有明确的信息及意见交换动机和一定的价值诉求。新闻事业总是随着交通和商业的发达而获得长足发展。新闻求真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则是在新闻事业成型且新闻成为学科之后。欧洲近代报业的兴起、职业新闻人的出现拉开了人类新闻事业的大幕。它以威尼斯 Gezzeta^① 的出现为标志，是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新闻成真是新闻事业的根本问题，并贯穿其发展的全过程。它从萌生到浮出水面，然后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大致经历了以下七个阶段。

1.1.1 萌芽期

新闻求真问题萌芽于原始人对真假信号的识别和区分。求生的共同目标把原始人凝聚起来，形成以地域为区隔的原始部落和村社共同体。面对周围神秘浩瀚的环境，他们必须交换各自的认知和态度，以便协调统一群体，整合力量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危险，获取食物和其他资源，谋求人类的延续。在狼奔豕突、刀耕火种的年代，最先发现猛兽或猎物的原始人感到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成功，便将信息传递给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并发动他们为达到同一目标而努力。他会采用群体内部约定的方式，比如篝火、狼烟、鼓声、口哨等传递信息。为了统计捕获的猎物和交流其他信息，他们还采用原始绘画、象征符号等多种非语言手段，例如：印加古国发明了一种相当复杂的结绳方法来记事；古代中国人用烽火传播敌情，在外族来犯、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最先发现敌情的士兵在城垛上点燃烽火以通知附近守军共同抗敌。

当年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在没有敌情时点燃烽火，附近不知实

^① 1563年，威尼斯与土耳其交战，政府发布《威尼斯公报》——在公共场合朗读，公布战争消息，获取这种新闻的人得付一枚当时的硬币（Gezzeta）。“格式塔”之后演变为公报、报纸的代名词，也借指新闻文体。

情的诸侯纷纷带领军队赶来救援，褒姒大笑；但当敌人真的来临时，被戏弄的诸侯看到烽火也无动于衷，周因此一败涂地。这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失天下”的故事。这个故事让人们认识到非语言传播的不实信息可以酿成巨大灾难，信息传播的真假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它说明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就面临信息求真问题，进而证明了新闻求真问题对人类生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信号是否按照人们约定的那样准确地传达信息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方式，而这取决于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准确判断，以及对约定信号使用规则的掌握和如实运用。“真实”最初就意味着“守信”——遵守共同的约定和彼此的承诺，“不真实”就是违诺和欺骗。

假如一个部落以击鼓作为野猪来临的信号，那么首先，部落内每个成员都应该了解这一约定，并遵守这一约定；其次是发现野猪的人必须准确判断野猪出现的地点、奔跑速度和方向，估算出接近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并选择恰当的时间击鼓围捕，这样围捕才不至于落空。对付来犯之敌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准确判断的基础上，诱敌深入，形成合围之势，然后发布真实的作战信号，以歼灭敌人。现代战争中的“信号弹”就是古代“烽火”的翻版，远古时期还有许多信号传播方法一直沿用至今。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传播技术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新媒介与旧媒介可以在相当的长时期内互补共存。

（口头）语言产生之后，人类迎来了传播史上的新阶段，口头传播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传播方式。与“一对多”的信号传播相比，口头传播可以“一对一”，目标更加明确。口语辅之以表情、手势、信号等等手段，传者、受者和传播内容的细分使信息传播的范围、容量和准确性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传播技术是柄双刃剑，它在使信息传播更自由的同时，也使不实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狼来了”的民间传说既是教育小孩不要撒谎的经典教材，也是口头传播虚假信息必然自食恶果的典型例子，那个传播虚假信息的孩子最终失去了周围人们的信任和救助而被狼吃掉，这种惩罚性结果警告人们必须时刻把真实性作为信息传播的起码准则。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以竹简、绢帛为载体在知识分子阶层传播，

精神创造比以往相对独立，但口头传播仍然在社交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是通过口耳传授的，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收徒三千，奠定了儒家思想传之久远的根基；纵横家也是各国游说，散播“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等外交思想，这既是围棋技艺的高度概括，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苏秦奔走于七国之间，传播法家主张，先在秦国宣扬“事一强以攻众弱”，后来又在其他各诸侯国口传“合众弱以攻一强”。^①

新闻求真问题就这样源于人类传播的日常实践并在人们的意识中萌芽了。

1.1.2 流变期

文字出现后，书写传播谬误的更正比口口相传更困难，这使得人们对传播的真实性更加重视。中国西周以前人们采用“刻契”的书写方式传播和保存信息，最早刻在岩石、龟甲和兽骨等材料上，后来刻在竹简上。从无意识的信手涂鸦到有意识的谨慎“刻契”，人类经历了一个在游戏中提升的过程，而“刻契”成为传承文明的方式大概是从中国的甲骨文、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开始的。后来汉字的演化越来越复杂，古人归纳出造字和用字的六种方式：形声、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和假借。汉字的书写也越来越规范，中国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毛笔，书写工具除了毛笔还辅之以刀和墨，书写材料除了竹简还有绢帛，司马迁就是用毛笔在竹简上写下了五十二万字的《史记》。当时如果写错一个字必须用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人在写每一个字之前都必须深思熟虑，信息传承的准确性以及《史记》的研究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人类文化生产能力和信息传播的可复制性增强，同一文本的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写书、抄书在文化人中逐渐盛行，文化以书籍为载体得到传播。书籍在传抄中谬误难免出现，再加上竹简断烂、纸张破损、战乱等主客观原因，传播的真实性变得扑朔迷离，此时的新闻求真问题体现为对书籍版本真伪

^① 《韩非子》说：“横者，事一强而攻众弱也；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

和字迹正误的鉴别考证。

比如《尚书》就有版本真伪之争：《尚书》即上古之书，内容跨越1500多年，上起尧舜，下至东周，包括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由史官写成，左史记“言”成为《尚书》，右史记“事”成为《春秋》。“言”和“事”就是今天所谓的“新闻”。

《尚书》真伪之争始于战国，诸子百家利用旧文献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儒、墨等学派手中都有《书》，按王朝汇编成《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还没有《虞书》一词，也没有《尚书》一词，《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今文家提出的。《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儒家编造了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成为《书》，并将之作为讲堂上的历史课本。它与《诗》（文学课本）一起成为士大夫的典型读物，也是《商君书》提出要秦国禁绝的两种读物。孟子、荀子也把《书》作为儒家的五种课程之一。到汉代，《诗》《书》《礼》《易》《春秋》被定为“五经”。这部原来的古史文献《尚书》，通过儒家的经典化，成了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尚书》以散文书写典章制度（典）、君臣相告的话（训诰）、祭祀的祷告词（誓）、向大众宣布的话（号令）等。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经典多靠口耳相传。在汉代，人们将当时通用的隶字称为今文，与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古文相区别，把口传经书用隶字记录叫作今文经。《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乱才传下来的，伏生以此在门徒中传授，门徒用隶书抄录流布，形成了西汉《尚书》学今文三家：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和小夏侯氏学。

汉代又曾出现几次《古文尚书》本子：第一次是《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的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比今文多“逸书”十余篇；第二次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中古文”，刘向用以校三家经文；第三次是《汉书·儒林传》所说的成帝时张霸献的“百两篇”，但由于是伪造的而被废黜，只有两篇“书序”流传下来；第四次是《汉书·楚元王传》中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说的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

的壁中古文，多出“逸书”十六篇（其篇名载《尚书·尧典·正义》），由孔安国献上，刘歆把它和其他三部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反对，从此引起了中国学术史上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第五次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记东汉初年始有的传说，谓河间献王得到《古文尚书》；第六次是《后汉书·杜林传》所说的杜林所得漆书古文本一卷，他整理加工，并授门徒，传下同于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没有所谓古文“逸书”，门徒卫宏、马融、郑玄等都作了传注，并对个别篇目分篇，共为三十四篇。

这些古文家作注，不同于今文家宣扬神学和阴阳五行等杂说，而是在尊崇“圣道王功”前提下多作文字训诂、制度名物等的解释。因此，《古文尚书》到魏晋时取代《今文尚书》立于学官，并被刻入《三体石经》。西晋永嘉之乱，今、古文都散亡，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广求经典。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但它被拆成三十三篇，另外伪造古文二十五篇，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全书各篇标有《孔安国传》的注，并有一篇《孔安国序》。“但从《史记》《汉书》看，孔安国并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又二十五篇与刘歆所举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它的破绽显然存在。”^① 汉代假托孔安国注的《古文尚书》在唐代就遭到质疑，宋代吴棫提出考辨，以后又经明清数人严密考证，最后判定这部书为“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从此《尚书》就以汉代《孔传》《孔安国传》作正注，孔颖达撰的《正义》作疏，成为官定本颁行全国，且其经文被刻入《唐石经》中，但实际上是将汉晋今文、古文、伪文混编而成。宋代把汉《孔传》和唐《正义》合刻成《尚书注疏》，明清时汇刻在《十三经注疏》中；另外，代表宋代朱熹等人对《尚书》研究成果的《书集传》到明清时被刻于《五经大全》之中，成了科举法定本。

由此可知，《尚书》在传承中经历了从《书》到《书经》《今文尚

^①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经书浅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30页。

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等不同阶段。版本很多，断简、脱简、错简、字体演化、排版格式、注家的个体差异等都易引起以讹传讹。《尚书》本来是用三千多年前岐周地区方言写成，此方言早成死文字，战国时人只引用少数好懂的句子，因此韩愈认为《尚书》的特点是“佶屈聱牙”。后来许多版本都是注家对它的深度阐释，与原来的《尚书》渐行渐远。清代及近世的学者段玉裁、章炳麟、郭沫若、徐中舒、顾颉刚都从事过《尚书》学研究。对《尚书》版本进行专门考证并撰写过三篇学术论文的刘起釪建议：鉴别《尚书》真伪，只需知道西汉今文二十八篇才是真的就行，或查看宋代蔡沈撰成的《书集传》，篇题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的就是真的，注“今文无、古文有”的就是伪的。《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两千年来被奉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它尚且真假难辨，其他书籍就更不用说了。

《尚书》的版本变化足以说明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变异，说明文字出现后读书人对书籍版本的甄别是新闻求真问题的集中体现，文字既是传播的桥梁，又是直接交流的屏障，这使新闻求真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文字能否真实地反映人们的认识，人们的认识是否与客观世界相符合，都必须经过考证鉴别后方能判断，考证后把真知告诉世人成为新闻求真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4年美国最畅销的小说《达·芬奇密码》叙述的就是一个保护“真实历史文献”的动人故事：郇山隐修会为了保护教会的秘密和关于耶稣的真实记载，与罗马天主教教权及政权展开殊死搏斗。小说提醒人们质疑今天的《圣经》版本，真经到底在何处？在遥不可及的“西天”还是就在取经的路途中？《西游记》是一个求真的隐喻。人们今天看到的《史记》是司马迁被迫在说别人要他说的话，在经历了封建统治者的修改和编撰，经过特定意识形态的塑造后，透过字里行间，人们很难看到为朋友李陵仗义执言的司马迁倍受摧残的灵魂。一切文字记录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和文化的大语境，人们无法领悟作者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心曲和真相，被遮蔽的比敞开的部分更真实。

因为有了文字，真实变得难以捉摸。也因为有了文字，真实仿佛

变得更加真实，凝固于纸张上的印记让人们确信自己捉住了真实。文字让真实具有了相对的时空稳定性，不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见过的景物”“听过的声音”那样转瞬即逝。

这表明了传说中仓颉造字的功与过。文字使人类劳动有了体力和脑力之分，出现了专事脑力的知识阶层，人们对文字产生膜拜，读书人因此受到尊重。继劳动的异化之后产生了文字的异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治人的统治阶级由此产生。文字成为社会建章立制并使统治合理有序的工具，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都说明了文字曾帮助统治者毁掉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奴役他人、掩盖真相。

但文字毕竟开创了人类传播的新纪元，它既使新闻求真更趋复杂，也锻炼了人类的思维和理性。处于流变期的人们开始透过文字去寻找真实，而不像文字产生之前那样“目击道存”。人类的智力在文字使用过程中得到提高。人类也脱离了蛮荒，建立了与自然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并用文字记录文明的演进，逐渐累积文化成果，搭建起人类进步的阶梯。

邸报的失实是流变期的突出现象，它使新闻求真由隐性问题变成了显在问题，由伪问题变成了真问题。梁启超将诏书分成明谕（邸报）和廷寄（类似于内参），可见邸报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话语平台，按照统治阶级意图及其媒介伦理认识、反映和评价事实。任何言说在敞开一部分事实的同时必然遮蔽另一部分事实。没有被言说的部分就是被遮蔽的部分，也就是失实的部分，这是广义的失实。这种无意的隐瞒通常能被受众容忍。但有意地隐瞒、歪曲甚至捏造事实等行为则会被视为违背社会伦理的表现，引起受众反感。比如：宋朝邸报报喜不报忧，不报不利于统治集团的内容。杨孜曾经上书宋仁宗：“乞下进奏院，今后唯除灾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过；自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官吏并科违制之罪。”^①《宋史·吕溱传》记载：仁宗时，少数民族依智高扰犯

^① 董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广州，宋仁宗下令不准邸报刊登，吕溱对此很为不满，他说：“一方有难，应当使四方都知道，共同努力，消除灾难。”清雍正二年（公元1723年）七月，飞鴉食蝗，庄稼丰收，大学士转吕松江提督高其位等人奏折，要求在邸报上登出此事，但雍正认为不妥：“蝗灾初起，又是何因。”因此没有登出。邸报失实原因有二：一是皇帝专权，统治集团对舆论的绝对控制。二是编发邸报的官员与权贵勾结，隐情不报，使邸报成为结党营私、明争暗斗的工具：就像秦桧定本，欺瞒皇帝和四方百姓；宋太宗时酒场官李益结交权贵，勾结邸吏，欺辱冯伉，皇帝迟迟不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有一份清朝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的邸报抄本，记载了一起天理会成员乱民戕官滋事的事件：

嘉庆十八年

奉

上谕本年九月初六日豫东交界地方有乱民戕官滋事拿获匪犯供系天理会邪教并接同与奏称会内首匪林姓又捏刘林在近京藏匿正在降旨飭拿间十五日忽有贼匪潜入紫禁城持械逞凶经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庄地方拿获林清一犯供称前生姓刘所有十五日潜入禁城贼匪均由伊派捕获属该犯传习邪教斡众谋逆罪大恶极今伙党残除首犯就获仰承

邸报中就骚乱及缉拿过程进行了连续报道，有关官员和皇帝还作了批示。从报道之前的“奉”“上谕”和文中的“奏称”“降旨”以及文末的“仰承”可以看出，邸报主要是为皇帝和官员写的，也是给他们看的，对事实的筛选和陈述必须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倒是一些民间小报比较能反映当时的民情民意。所以说，新闻求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唐宋时期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提高了文本复制的效率，德国古登堡在中国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综合雕刻、冶金和化工等多种技术改进金属活字印刷术，使欧洲文明突飞猛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蔓延和扩张，并直接催生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论是《人权宣言》还

是《共产党宣言》，无不借助印刷的力量，以小册子和报刊的形式传遍欧洲乃至全世界。

尽管书写方式和传播技术的改进加速了文化的生产和复制，但却降低了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文本的保真性能，新闻求真问题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诏书、官府告示、朝廷邸报及民间各种小报等文字传播媒介，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不同阶层的意见，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和话语性质。而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往往以言说的自由和传播渠道的畅通为标志，正如“和谐”的字面意思：口中有粮为“和”，有口皆言为“谐”，和谐社会就是吃饱喝足的人们有了说话的地方。但在纸媒时代，传播媒介的操控者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以传者为中心的单向传播使受者处于弱势地位，统治者用文字为大众洗脑，强行灌输他们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念，传播真实性失去了客观标准，新闻求真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受者的怀疑、抗争和反叛。

1.1.3 演进期

新闻求真问题随着近代报业的发端而进入一个全新的演进时期，具有明显区别于流变期的特征——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使传媒业获得空前的自由。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它以市场化为表征，以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为内在权杖，支配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新闻传播也随着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近代国民性改造从封建的君权王道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市场中受制于客观规律的一个朝阳产业。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宗教改革带来的资本主义大发展中，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以理性和禁欲精神为核心的新教伦理促进了各行各业的产业化，以采集、传播和销售新闻为职业不再是梦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新闻业在拓宽人类认知领域的同时也衍生了全新的生存方式，成为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它满足了资本主义的效率要求和人类求知的普遍愿望。

资本主义的萌芽催生了近代报业，加速了传媒产业化的进程。

《威尼斯公报》的运作流程使新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化特征，为公众生产新闻的职业新闻人队伍应运而生，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逐渐壮大。封建专制下新闻求真主要表现为普通民众追求话语权和言论自由，而资本主义的自由意识形态粉碎了封建专制体系，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想为自由言说提供了学理依据，谁？说什么？不再取决于当权者，而是取决于“自由意志”。马克思认为哪里有新闻出版哪里就有新闻出版自由，“自由的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①。人类迎来了一个无所不说的时代，上帝素来的权威地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贸然科研结论也时刻面临挑战：地球是不是宇宙的中心？燃烧是否靠燃素？空气中有哪些化学元素？原子是不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如何才能破解生物遗传密码？苹果落地现象揭示了什么？天体之间是否存在引力？近代新闻传播在启发人们思考方面功不可没，它在开启人类智慧的同时也让人类反躬自省，寻求发展的路径，而求真的意志始终贯穿于其中。

近代报业的繁荣与 17、18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密不可分，铺天盖地的各种报纸和印刷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了社会自由化进程，民权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自由、民主的思想为报业的繁荣创造了宽松的氛围，社会契约为公众话语权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小册子满天飞，各种假说、猜想层出不穷，思想流派异彩纷呈，学术观点错综复杂，新闻求真不再是该不该说的的问题，而是该怎么说的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追求真理的问题。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布鲁诺坦然面对异端裁判所迫害，其在火刑柱上可能感受不到身体的痛苦，因为内心对真理的渴求比这更强烈，他穷其一生使哥白尼学说走向胜利。还有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 179 页。